

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

陈培浩

【摘要】“历史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潮流。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经历了从文本批评的局部探索到文学史叙事的整体重构,再到对“历史化”的反思和深化的演进过程,是90年代以来知识转型和学科自觉的结果。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凝结了中国学派的理论经验:“历史化”是一个从西方理论到中国方法的本土化过程;“历史化”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过程;“历史化”是阐释理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有机结合。“历史化”的探索历程表明,简单套用既有理论、疏离文学性和当代性、与文学批评割裂等并非真正有效的“历史化”。“历史化”并未完成,它召唤着新的探索和赋形。

【关键词】历史化;当代文学研究;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阐释理性

【作者简介】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23.5.152~16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诗的整体性研究”(20&ZD2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历史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范式之一,内蕴着中国学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创造。一般认为,“历史化”思潮“表现出反本质主义、反形式主义的认识论倾向”^[1],打破文本“内部性”和“审美性”幻觉,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方法转型。学界以往主要聚焦于“历史化”的理论资源、内涵、特征、可能和限度等议题,对“历史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即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和渗透性的研究范式如何达成这一议题尚无充分研究。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取得了哪些最新进展?作为一个学术谱系如何生成和演进?“历史化”如何经历从西方理论到中国方法的转变?“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何在?又应作何反思?通过“历史化”理解中国当代学术范式的内在更新,提炼中国学者的理论智慧,进而建设一种与世界对话的中国阐释学,是本文的学术关切所在。

一、“历史化”研究的崭新探索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历史化”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学学科主流研究方法。此阶段,曾以《中

国当代文学史》引领“历史化”研究潮流的洪子诚再次以《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材料与注释》《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著作探索着“历史化”的崭新可能性。这四本著作虽非严格理论规划的结果,客观上却探索了三种“历史化”的新可能:文本解读的“历史化”(《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史料解读的“历史化”(《材料与注释》);文学关系的“历史化”(《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呈现了洪子诚“历史化”文本解读的探索。主要方法包括:在接受史中读文本;在版本变迁中读文本;在个体阅读史中读文本。洪子诚的“阅读史”标明“我的”,即区别于公共阅读史,但《我的阅读史》并非一般性的个人阅读史,而是吸纳了“接受美学”方法,呈现文学接受的阶段性、过程性和历史语境性的“阅读史”。洪子诚所念兹在兹者,是通过文本接受的差异化而重返不同的历史具体性中。洪子诚由自我阅读史而“直面当代历史的‘情感结构’”^[2],他对巴金《家》、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加缪《鼠疫》等经典作品的解读,并非要提供确定的新答

案,而是揭示文学“理解”是如何与特定语境紧密相关。呈现“历史”的敞开性而非确定性,正是洪子诚“历史化”方法的精义之一。

《材料与注释》是洪子诚对史料进行“历史化”的独特探索,包含了一种历史阐释的“自限性伦理”。《材料与注释》处理的对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是包括“讲话”“会议记录”“社论”“检讨书”等特殊文类的非虚构历史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洪子诚干脆放弃了“文章”的形式,不惜“降格”为“注释”。从材料到文章,离不开考证、推理、演绎、思辨和阐释,而主观投射和理论建构往往在丝丝入扣、严丝合缝中产生。化阐释为注释,意味着对“强阐释”的警惕。所谓“强阐释”是指阐释者以鲜明的价值立场、论述激情和学术架构对历史作出的叙述和判断。“强阐释”以积极的历史主动性发声,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阐释”不容置疑的立场却不利于对诸多不同声音如何产生、何以如此作出客观辨认。《材料与注释》对阐释主体、阐释文体、阐释语调等元素存在的“主观性”都保持警惕,意味着自限性被提升至阐释伦理的层面。中国当代学者的“历史化”实践,从借助西方理论资源进行“历史化”,到将西方理论加以“历史化”,再到对阐释对象、阐释主体、阐释语言进行“历史化”,实现了“历史化”的纵深拓展。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对国际文学关系加以“历史化”的探索,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比较文学思维。不同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洪子诚并不一般化地谈“影响”。比如他谈爱伦堡,却不是谈“爱伦堡在中国”,而是谈复杂的中外历史语境如何影响“当代文学”对爱伦堡的接受。这不是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而是以“相关性”为方法的研究:通过“相关性”问题的穿针引线,“世界文学”成了认识“当代文学”的镜像,“相关性”也成为新的“历史化”方法。洪子诚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出发的“相关性”方法提示着:与其说存在某个确定的、整体的“世界文学”,不如说“世界文学”总是各国“当代文学”视野中差异化、语境化、错动的“世界文学”。《当

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遇,也是“历史化”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对话,显示了中国学派为世界文学提供中国方法的理论创造力。

对“历史化”做出新探索的学者还有吴秀明。吴秀明较早关注并长期跟踪历史文学和当代文学史料学问题,他近年的研究集中围绕史料问题和“历史化”问题展开,并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等书。虽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杨等人的研究在前,吴秀明的“历史化”研究自有其重要的学术开拓性:第一,重视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经验对“历史化”问题进行理论建构。相比之下,洪子诚和程光炜等学者更侧重于“历史化”学术实践。洪子诚将“历史化”诉诸当代文学史、文学文本、文学关系等对象;程光炜以“历史化”方法“重返八十年代”,其近年的莫言家世考证也侧重于个案实践。吴秀明则力图对“历史化”问题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理论建构。《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历史化的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中编“历史化的主要路径与研究方法”,下编“历史化相关专题探讨”。全书力图对“历史化”的知识谱系、展开方式和相关论题作出宏观而整体的研究,有力推进了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的理论化进程。第二,构建了宏阔且有可实践性的“历史化”研究框架。吴秀明既重视“为何历史化”的理论思辨,也重视“如何历史化”的理论应用。他将“历史化”落在“述学文体”“经典化”“文学史”“史料学”等研究范畴中,使“历史化”具有更强的及物性、实操性,在如何将“历史化”与原有研究范畴相结合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示范。第三,追求更加辩证的“历史化”方法论。吴秀明努力廓清“历史化”与诸多周边命题的关系,对“历史化”与“文学批评”“文学性”“历史观”等问题作了深入、理性的辨析,使“历史化”获得更丰富、多元、辩证的理论品格。比如,吴秀明认为“历史化”的目标在于获得更客观、稳定的历史叙述,但他也强调“历史化”对异质性元素的发现和敞开,这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化”思想。我

们知道,结构主义强调从个别到一般的思想方法;后结构主义则更强调发掘为“结构”所压抑的异质性经验。事实上,以一般压抑特殊,或因特殊否定一般,都不免陷于偏执。不相信一般性,容易将历史叙述虚无化;只相信一般性,则容易导致理论论述的封闭。强调“历史化”对异质性的发现,实质是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应是稳定性和开放性的结合。这种“历史化”的思想方法不无启示。

洪子诚、吴秀明“历史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相比之下,洪子诚更多“历史化”实践,更强调再“问题化”;吴秀明则更重理论提炼,更追求客观、稳定的历史判断。但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洪子诚也努力求索历史之真,吴秀明也强调“历史化”对异质性开放。不妨说,洪子诚、吴秀明等学者的研究,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将“历史化”研究推至一个新高度,为中国式“历史化”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们的研究不是“历史化”的完成,而是“历史化”学术之旅的又一程。

二、“历史化”:当代谱系和内在嬗变

有必要将“历史化”置于当代文学学科史视野考察,以显影这一学术探索的过程、启示与限度。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可约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历史化”的发生期。20世纪90年代初,新兴文化理论推动了李杨、唐小兵等青年学者对左翼革命文艺的重评,一股将文本语境化的“再解读”潮流开始兴起。成果以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和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代表。2.“历史化”的探索期。“历史化”方法推动当代文学史理论思维发生转型,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等著为代表。3.“历史化”的深化期。“历史化”逐渐成为学科重要方法,影响了当代文学从局部现象到整体史述的重构。代表作有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等。4.“历史化”的反思和再探索期。“历史化”

在产生广泛影响之后,未被定型化,相关学者继续探索着“历史化”的多种可能。以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和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等著作最具代表性。上述著作最早出版于1993年《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最晚在2022年《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跨度近三十年,一个前后相生又参差多态的“历史化”学术谱系由此彰显。

从学科史角度看,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和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都有方法论创新意识。出版于1993年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是李杨的博士论文,它以中国红色革命文艺为研究对象,大量借用新潮文化理论,重视挖掘“形式的意识形态”^[1],指认革命文艺具有“反现代性的现代性”^[4]。不同在于:《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作为李杨的博士论文,主要采用宏观综论形式,文本批评只是作为补充;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则是论文集,文章都从文本重读出发,这种个案研究冲击力很强,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许跟“再解读”的命名及文本批评这种形式有重要关系。不无意味的是,日后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再解读》也放弃宏观综论形式,而采取文本批评形式。

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审美、现代派等概念成为一时潮流。相形之下,“左翼文学”和“50—70年代中国文学”在李杨“写作博士论文时还非常冷清”^[5]。彼时,“左翼文学”常被认为“是‘政治’而不是‘文学’”^[6]。李杨和唐小兵是较早基于“多元现代性”视野考察80年代审美现代性知识的学者。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一种话语构造。“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知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代表了另一种“现代性”知识。因此,他们提出的“‘反现代’的现代”(李杨)与“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唐小兵)就带有为左翼文艺一辩的色彩。现在一般将“反现代的

现代性”这一提法归于汪晖的名下。事实上,李杨和唐小兵比汪晖更早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类似观念。这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正在兴起的“批判现代性”思潮有关。这种思路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多元的、相对的,而非普遍的、绝对的话语。例如,劳基·塞凯《现代性及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及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性思潮》就对李杨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引述的理论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和《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于“历史化”转型有筌路蓝缕之功,但“历史化”的真正影响力恐怕要到21世纪前后才逐渐发挥出来。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就与这一观念的影响分不开。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认为对文学史写作和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启示^[7]。研究者多从此书对文学史研究和编纂的贡献着眼,事实上,此书无疑有进一步为学科实践“历史化”方法之功。此书最早运用“历史化”方法进行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对文本及文学现象背后生产机制的强调,潜移默化地成为学科示范。从学科史看,李杨、唐小兵对“历史化”有开启之功,但使“历史化”方法获得较大学科影响力却是洪子诚,而进一步使“历史化”成为一种学科热潮乃至常识的,则是程光炜、李杨领衔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实践。

“重返八十年代”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继续推进。“重返八十年代”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李杨与洪子诚的一次关于文学史写作问题的通信。李杨在信中指出:“‘50—7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就不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而是一种‘一体化’与另一种‘一体化’之间的关系。”^[8]依李杨之见,洪子诚将“历史化”方法引入了当代文学史编纂,但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有开创,下编(80—90年代的文学)却不尽如人意。此番对话之后,“80年代文学”如何重返,如何有效“历史化”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此后,李杨和程光炜共同倡导“重返八十年

代”,旨在将前辈史家未完成的“历史化”重任继续推进。李杨的学术研究始于对“新时期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背后启蒙论知识框架的质疑:“就我的工作目标而言,是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是‘重写文学史’,而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一些前提、一些理论预设进行反思”。“讨论‘五十一七十年代文学’的‘文学性’”,或是“揭示‘八十年代文学’的政治性”^[9],构成了李杨的两种学术实践,前者对应于《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后者落实为他为“重返八十年代”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支撑。虽表达了对“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不满,但李杨于“重返八十年代”有倡导而少实践,“重返八十年代”的具体研究实践主要由程光炜教授领衔的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完成。

无疑,“重返八十年代”是以“历史化”为方法的学科转型努力,其实践者对学科方法论的创制相当自觉。程光炜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对当代文学学科过于“批评化”的不满和焦虑。他担心既有文学史“对批评家的这种感性化文学感受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10]。文学史述对于文学批评判断不加甄别的“认同”,文学研究对于上一代权威论断和方法不加深思的“认同”,在程光炜看来都是不够“历史化”的表现。程光炜的研究“反对历史的本质化叙述”,“反对历史的‘理论化’”,“反对‘去历史化’的研究”^[11];其“重返”的目标,在于学科完善,在于抵达一种更成熟的文学史意识。与李杨相比,程光炜表现了更强的学科意识和史家自觉。李杨要颠覆“八十年代”知识构成和认知方式,却无重构文学史的行动和实践。唐小兵和李杨的“再解读”乃为质疑旧知识;程光炜却更进一步,试图用新视野、新方法建构出一套相对宏观、完整的文学史叙述。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是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的两部专书。《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是课堂讲稿,多从文本出发,寻找进入“八十年代文学”的新角度。《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则超越文本批评,力图实现从文本、事件、现象到文学史哲学的全覆盖。程光炜的

“历史化”要旨在于揭示知识建构的过程,将思考探入思潮、事件、作品背后的发生机制,研究重心从描述“是什么”转变到回答“为什么”。

不妨说,正是在“重返八十年代”产生广泛影响之后,“历史化”作为一种学科方法才真正渗透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方法进一步扩展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常规思维之一,甚至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范式。影响所及,以“历史化”方法进行文本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潮流。“重返八十年代”也成为“历史化”这一学术接力工程的重要界碑。

三、再“历史化”:从西方理论到中国方法

事实上,当代文学不少“历史化”先行者,都曾存在不同程度的简单套用、食洋不化的问题。“再解读”带来“历史化”新视野,但“再解读”践行者理论先行、过度阐释等现象也广泛存在:李陀质疑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采用“大众文艺”这一概念缺乏对40年代延安文艺历史语境和更高政治要求的洞察^[12]。王彬彬则质疑唐小兵依据1953年《毛泽东选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修订版而非40年代初版本进行研究的学理问题^[13]。程光炜认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书中刘禾“满足于对‘国民性知识’做深入的理论推演,而并未把‘国民性’概念和鲁迅本人当时所依存的历史语境也包括在讨论之内”^[14]。批评者称“再解读”者“既敢于生搬硬套一种理论,也不惮于将多种理论混搭使用”,导致了“‘想当然’和‘绕脖子’”^[15]之弊。不能无视“再解读”先行者的“历史化”探索,但理论先行,忽略历史语境的复杂性,这不是“历史化”,而是不够“历史化”。事实上,唐小兵等人也反复思考“历史化”如何有效达成的问题。李杨认为必须既将“对象‘历史化’”也将“自我‘历史化’”^[16],贺桂梅认为“不能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对待理论”^[17]和历史。可是,认识和实践仍有距离。这提示着,“历史化”难以轻易达成,更无法一步到位,而是一个不断再“历史化”的过程。这里的再“历史化”包括三层意思:其一,中国学者的“历史化”实践产生了独特经验;其二,“历史化”是一个从西方理论到中国方法的转化过程;其三,

“历史化”不是静态、凝固、一劳永逸的,而是动态、试错、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化和自反性叠加,形成不断再“历史化”的过程。

首先,“历史化”与文本批评的结合是独特的中国经验。“历史化”在詹姆逊主要是一种理论建构,但在中国化过程中摆脱了理论自转,而与文本批评结盟。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和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都选择文本批评的形式,特别是李杨还从《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的理论研究回撤到文本批评,跟程光炜从文本批评“跃迁”至文学史建构相比,轨迹相反,颇值得回味。事实上,在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文本批评含金量不如理论研究的“共识”。文本批评常被认为只是对个别、局部、偶发现象的理解,理论研究才是对整体性、深层次、规律性问题的把握。因此,李杨从理论研究回撤到文本批评就更值得深思。《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与《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都包含着鲜明的方法创新,但“再解读”将对象限定为某个文本,抗争之“路”预设的则是深层的思维和方法。前者更具体、可感,更具操作性;后者更理论化,也更具挑战性,对于探索者本人有各种掣肘,对于后来者就更加难以上手。显然,文本批评在“历史化”学术转型中扮演了急先锋角色。通过新方法对诸多文本的逐一解读,势成燎原,形成一定学术潮流之后,再进行文学史述的重构,这比一开始就进行整体宏观的理论重述更现实。因此,从学术创制和接力角度看,正是唐小兵、李杨等人的文本“再解读”,构成了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史述重建的基石。

其次,中国学者的“历史化”实践也探索着修订西方理论的可能。中国学者从借用西方理论诠释中国文本,到将西方理论中国化,在本土语境中修订西方理论,大大发展了自身的“历史化”方式,丰富并拓展了“历史化”的理论内涵。以李杨为例,其研究呈现了从理论阐释折返到文本批评,从关注“多元现代性”到提炼“历史化”方法,从袭用西方理论到修订西

方理论的变化。李杨有意识地扬弃使中国文本成为西方理论注脚的做法,力图以中国叙事导出“重写”西方理论的可能。这既将“历史化”导向更复杂的层面,也呈现了更鲜明的中国意识。

以李杨对《青春之歌》的分析为例。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中,对《青春之歌》“现代性”的论证就不无生硬,判断主要是通过理论阐释推导出来。李杨的论证逻辑是:《青春之歌》是成长小说——成长小说是现代文学——《青春之歌》的人物进步与国家进步同构——《青春之歌》属于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寓言。诸如提出“现代小说总是描写一种主体从客体中生长出来的过程”^[18],并将人物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构,认为“林道静的成长与中国寻找主体性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19],这里显然直接搬用詹姆逊的民族国家寓言理论,逻辑较为粗糙、套用过于直接,与李杨所推崇的“历史化”还有不小的距离。到了《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李杨对《青春之歌》的解读重心和策略有了明显调整。抛弃了此前“文学叙事——民族国家寓言”这样的理论预设,从“知识分子叙事”“情爱叙事”“成长小说”三个维度展开,原有的分析被浓缩在第三部分。此际,李杨更强调《青春之歌》“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当然,也不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提出这本小说的独特性恰恰是“政治”与“恋爱”的神奇组合^[20]:“一方面是以性爱的方式对政治观念的演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治话语对性爱的改写。”^[21]李杨显然意识到,《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中的分析不过是对詹姆逊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政治话语与恋爱故事的组合则是他基于本土经验把握《青春之歌》的努力。因此,李杨将《青春之歌》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恋爱”叙事谱系,以经典的中国叙事逆写和修订了著名的西方理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好像是关于民族和阶级寓言的文本,背后总是隐含着另一种政治:关于个人欲望、性和利比多趋力的寓言。”^[22]从套用西方理论到强调中国经验,从中国叙事反观并逆写西方理论,呈现了中

国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意识的转向,李杨也置身前列。

再次,中国学者的“历史化”实践在动态、试错、自我反思和扬弃中获得动力。仍以李杨的研究为例,《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选取《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红灯记》《白毛女》等多部红色经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青春之歌》《白毛女》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一书中已有重点分析,收入《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时作了较大调整和修改。前后比较,可以看出李杨“历史化”批评策略上的调整和坚持。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除了继续强化及优化多元现代性的知识考古,尽量减少理论先行带来的干扰外,李杨强化了对经典文本叙事谱系的溯源,如通过对“英雄”“儿女”“鬼神”等元素的辨认,令人信服地指出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包含的传奇元素,以探讨“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问题。同时,李杨也更加重视对版本演变的研究,如对《红灯记》《白毛女》,皆有较详细的版本演变的“历史化”探究。

李杨尤其善于构造文本的互文镜像,从而带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在解读草明《乘风破浪》时,开篇李杨选择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互文镜像:“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历来被视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当读者和评论者惊叹作家蒋子龙的创造性,甚至将这部小说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小说’的巅峰之作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部小说与一部20年前的旧作之间的关联。这部作品就是草明出版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23]李杨揭示《乘风破浪》和《乔厂长上任记》之间的历史关联,以同一叙事模型联结了两个背向而行的时代,落实“形式的意识形态”探讨,令人感慨“历史化”之妙手与充满想象力的史心互为表里。

“历史化”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西方理论到中国方法的过程。再“历史化”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法的创造性

融合和生成。

四、“历史化”的经验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审美形式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史视野、数字人文等研究方法轮番上场。“历史化”研究方法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过程复杂曲折,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历史化”到再“历史化”的过程。回眸这段学术史,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基于中国问题、中国立场的独特经验:

(一)“历史化”与中国方法的生成。吴秀明认为,“历史化”在外源上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等人的影响,“在内源性上与中国汉宋两学诠释系统具有血脉的关联”^[24],而后者受到了忽略。“历史化”概念虽由西方学者提出,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优秀的当代中国学者对中西史学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历史化”理论呼之欲出。比如,洪子诚的“历史化”实践对自限性阐释的坚持及对阐释理性的追求;他为比较文学贡献的“相关性”研究方法,放在国际学界也不无启示。尤其是,中国学者在理解历史叙事性之后继续对历史之真的求索,对“历史化”辩证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历史化”理论的重要基石。洪子诚认为,辨认“真实”的历史确切性,“将它们当作‘事实’来陈述,就是一种历史责任”^[25]。新历史主义带来多元的历史认识论,但清醒的中国学者并未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洪子诚、吴秀明、程光炜等学者在后现代理论的冲刷下对历史之真仍葆有信心并孜孜以求。梳理“历史化”研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法,构成了“历史化”研究新的起点。

(二)“历史化”的多元、辩证品格。“历史化”是一个概念、多种实践。不同学者所理解的“历史化”不尽相同。这既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丰富性,也构成其内在的张力甚至冲突。不同“历史化”实践各有其长处和限度,应珍视并保持“历史化”的开放性、多维性和辩证性,而非将其定于一端。比如,在“历史化”的问题意识上,就有“敞开问题”(洪子诚)和“稳定历史”(吴秀明)的分野。这二种看似对

立的问题意识未必不能兼容。二者或“以材料为本”,或“以问题为本”^[26],各有其优势和限度。“以材料为本”者认定“历史化的目标是‘稳定历史’,是让研究对象在‘流动性’和‘丰富性’的阐释状态之下变得更加厚实”^[27]。持此论者相信,“愈是成熟的学科,其‘历史稳定’性往往就愈高”^[28]。“以问题为本”者,目标“不是将‘事实’在‘历史’上加以固定,相反,倒是要暴露事物的构造性质,彰显它们的不稳定的性质”^[29]。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化”其实是这两者不断的交互。凝固的历史叙述需要问题为本的“历史化”去打破,而敞开后的问题则召唤着新的“历史稳定”。“历史化”在方法、途径上是多元的,在处理历史与当代、研究与批评、历史化与文学性等诸多关系时则需要更辩证的立场和方法。

(三)“历史化”是阐释理性和历史主动性的结合。批评即阐释,阐释即理解,理解受制于“前理解”,“历史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回到“前理解”的历史语境来解释“理解”何以产生。因此,“历史化”吁请阐释行为上的客观、中立和理性,并对阐释主体的权力做出限定。“历史化”召唤自限性的学术阐释,要求阐释者明确知识的来源、语境和边界,并意识到阐释行为的有限性。“历史化”对阐释科学性、公正性的坚持实质是对阐释理性的追求。但强调阐释的自限伦理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立场和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化”是阐释理性、文化价值与历史主动精神的结合。“历史化”反对阐释的无限性、任意性和无序化,但并非刻板地反对阐释的多元性和可能性,更不是对阐释行为历史主动性的否定。洪子诚、程光炜、吴秀明、李杨、贺桂梅等学者的“历史化”实践,虽都有其限度,但也都包含着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即对当代学术历史方位的判断,对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突破和创制。中国学派的实践启示着:阐释理性和历史主动精神的结合,才能生成有效的、生机勃勃的“历史化”。

自然,“历史化”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方法,“历史化”既不能一网打尽,也绝非包治百病;“历史化”既包含着中国学派多元的探索和珍贵的理论

经验,也需要通过对自身持续凝视、反思来自我更新。近年,程光炜、郜元宝、钱文亮、张清华、张均、李遇春、斯炎伟、周展安、李建立等学者的诸多辨析也将这一命题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历史化”被创造出新可能、新境界,也在广泛的沿用、袭用中存在套路化、表面化和凝固化的弊病。以下几个倾向值得反思:

(一)对既定“历史化”理论的简单套用。“历史化”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刻板沿用传统史学理论。比如,不加反省地将詹姆斯“永远历史化”理论奉为圭臬,将知识考古作为唯一方法,必然无法回应具体的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李杨较早接受詹姆斯“永远历史化”理论,他批评洪子诚文学思维中仍有启蒙论残余,“历史化”不彻底。但以“历史化”放逐所有的文学价值的做法,反而落入了新的迷思。同理,传统史学理论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仍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中国传统史学使用目录、校勘、版本、考据、辑佚等手段,提供了追踪和确证历史真实的方法支撑。近年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也在当代文学史料学中得到复兴。相信史料,其实是相信史料中蕴藏着通往历史真实的通道。但是,历史真实并非自明地显露在史料中。从材料到史料,从史料到历史真实,需要有效的学术阐释和问题意识的穿透。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绝非简单套用西方和传统理论就能完成,食洋不化和泥古不化都不足为训。“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历史化”理论,必须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

(二)对“文学性”的隔膜、疏离甚至遮蔽。多年前,张清华便指出“历史化”“对科学性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文学性的理解”^[30],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后现代主义者喜欢强调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建构的,不存在确定的、本质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文学性”。这种说法自有其道理,不同时代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但在一定历史阶段,“文学性”仍有其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对“文学性”进行“历史化”并不意味着审美鉴赏

力变得不重要。遗憾的是,现实中确实不乏以“历史化”为幌子公然放逐“文学性”,挥舞历史或文化理论的武器曲解、肢解甚至践踏文本的做法。在践行“历史化”多年以后,近年重申“文学性”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我们不应在“历史化”与“文学性”之间进行翻烙饼式切换。“历史化”与“文学性”必须在更高层次完成融合。

(三)将“历史化”等同于“史学化”甚至“史料化”,缺乏对文学学科本位的探索。郜元宝指出近30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倾向,其结果是“历史问题的考索既不清楚,原本要解决的文学问题也被搁置一边”^[31]。也有学者以为所谓的“史学化”实质是“历史化”,是当代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语境激发下对于新的思想理论资源的吸纳和应用”^[32]。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既有较高质量的“历史化”,也存在将“历史化”等同于“史学化”甚至“史料化”的倾向。吴秀明提出,“历史化”是“将当代文学放置在需要不断阐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当作一个相对陌生的对象进行考察,并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知识谱系”^[33]。事实上,文学的“历史化”不仅要求再阐释并建立新的知识表述,还特别要求以文学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文学研究从其他学科借用了大量理论和方法,大大打开了研究的可能和局面,但以其他学科为方法,文学越来越沦为对象和客体。文学研究的本位方法在哪里?既不走审美形式主义内部研究的老路,又不简单地因袭文学社会学外部研究路径,这样以文学为本位的方法无法现成认领,而召唤着新的探索。

(四)将“历史化”与文学批评简单对立,缺乏当代性意识。学界通常认为,批评与当代的关系更紧密。由于缺乏时间的距离,当代较难被学术化和“历史化”,只能诉诸较为主观的文学批评。这种相当普遍的观念预设了批评与“历史化”的鸿沟,并设置了二者的等级关系。一些“历史化”践行者,对此也有所反思。洪子诚强调,“‘历史化’对我来说,不是‘祛批评’”^[34],吴秀明也希望建立“历史化”与文学批评

的有机联系。但出于对过度“历史化”的不满,近年也有学者直接提出“反历史化”的呼声,“尼采曾说,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35],呼吁重新认识“当代性”及批评的意义。诚然,真正有力的批评,是在充满未完成性的第一现场辨认问题、想象未来、创造思想。未来的道路,往往是被最有力的批评照亮的。相比之下,批评更具介入性和行动力,而“研究”倾向于知识体系的凝聚和提炼。二者其实可以交互而非必然互否。“历史化”不是一般性的打捞旧物,而是通过凝视历史回应当代。我们既倡导有历史感的批评,也应追求有批评行动力、当代性的“历史化”。

换一种共生而非对抗的思维,便会发现:“历史化”并不必然有悖于文学性和当代性,“历史化”并不一定祛除批评。“历史化”这一命题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它召唤着新的探索和赋形。

参考文献:

[1][32]钱文亮:《“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2]贺桂梅:《直面当代历史的“情感结构”:读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现代中国》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探究“形式的意识形态”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的理论主张,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一书的前言以之为标题。

[4]李杨指出:“反抗现代性是现代性逻辑的一部分,换言之,现代性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包含了这种反抗。”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32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5][6][16][20][21][22][23]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365页,第366页,第366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6页,第32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该观点来自谢冕,见1999年9月10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讨会”,该研讨会纪要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年第6期。

[8]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9]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10]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11]张伟栋:《范式及其不满——“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史转向》,《文艺争鸣》2021年第12期。

[12]李陀等:《语言·方法·问题:关于〈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前言)〉的讨论》,《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唐小兵主编,第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15]王彬彬:《〈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以唐小兵文章为例》,《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

[14]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第2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唐小兵、黄子平、李杨、贺桂梅:《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18][19]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55页,第63页。

[24]吴秀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25]洪子诚、陶东风:《关于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的对话》,《广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26]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27]斯炎伟:《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几点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28]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科意义及其与外部社会的结构关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29][34]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洪子诚研究资料》,罗雅琳编,第448页,第44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30]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31]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33]吴秀明、周诗寒:《史料、历史化及其相关问题思考——吴秀明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35]周展安:《“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